

周平 著

走出伊甸园

——《圣经》人学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

B971
Z675



走出伊甸

——《圣经》人学

周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韩 波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 潮

走出伊甸园——《圣经》人学研究

周 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勘察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85 千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618—9 / I·691 印数：1—1500

定价：20.00 元

序

石 坚

“十年浩劫”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长辈那里得到一本中文译本的《圣经》；一口气读完后，只觉得更加困惑，主要是当时对西方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书读得太少。八十年代初作为政府交换留学生到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学习，有幸听到诺思洛普·弗莱先生讲授的莎剧和英文圣经课，获益匪浅。回国前夕，宗教文化课的教授又送我一本弗莱先生的新作《伟大的代码》，拜读后对《圣经》与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此后的十多年里，在文学学习和教学中，我便留心收集国内出版的有关《圣经》的书籍和文章。

《圣经》被称作为“万书之书”，在西方文化中被视为“书中最中心的一本书”。在西方，可以说人们处处都生活在《圣经》的影响之中，无论是政治上，文化和风俗上，还是西方文学、艺术传统中，《圣经》的痕迹无处不在。《圣经》常常只被看作一部宗教著作，但书中的故事内容在西方世界中几乎众所周知。《圣经》作为西方文化、文明史中的传世之宝，其伟大在于它晓人以理、警醒世人。从《圣经》故事中曾产生过一系列庄重、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难怪有学者说英国、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都携带着《圣经》的声音，对《圣经》作着无穷无尽的注解。但

丁、莎士比亚、弥尔顿、班扬、拉辛、歌德、雨果等文学巨匠的传世作品中《圣经》的影响和痕迹随处可寻。其原因在于《圣经》从古至今“以一个整体影响着西方的想象力”。

青年学者周平女士送来她多年潜心研究《圣经》的成果《走出伊甸园——〈圣经〉人学研究》，其书名让我为之注目。多年来，国内有关《圣经》的书籍多停留在词典编辑、注释、讲解上，像《走出伊甸园》这样把《圣经》放在西方文化、文明史和文学史的语境中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还实属少见，特别是本书所选择的以人为本的切入点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周平女士在学术研究中走出了自己的路。读完《走出伊甸园》这一书稿，使我想起了弗莱先生在《伟大的代码》一书导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不像其他动物那样，直接地赤身露体地生活在大自然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神话世界中，人类出于对自身存在的关注，产生了种种假想和信念，从而构成了这个神话世界，而这一切多半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用艺术或文学的形式来表现人们的想象时，我们只知道这些想象表现了神话世界的构成成分，并没有清楚地理解它们构成的这整个世界。实际上我们从这个由人类的关注构成的神话天体中所见到的一切，都具有社会前提和文化的继承。”在这神话世界中其核心当然是人。周平女士的论著正是从对《圣经》文本分析着手，探讨了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人性、人情、人心、人行及人道，探讨了赋予《圣经》永久生命力的人学价值。

周平女士勤于钻研、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走出伊甸园》一书中，特别是在最后三个篇章中，她对一些困扰人们的问题，做了认真思考。谨祝周平女士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出一条自己的光辉道路来。是为序。

1999年8月于四川大学培根楼

前 言

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也从不信任何宗教，但我写这本书时的虔诚心理决不亚于任何朝圣者。我的心不是被上帝的万能所折服，而是时时为《圣经》中那丰富的想象力、充满生活情趣的描写、幽默而富有创造性的比喻、朴素而古远的激情、简洁明快的笔调、深邃的思想内涵以及深刻的人生道理而深深吸引。这本曾给予弥尔顿以灵感、曾引导无数中世纪作家步入文学殿堂、曾让雪莱与拜伦喜不自禁、曾照亮莎士比亚全部戏剧和诗歌、曾赋予托尔斯泰的《复活》以生命的书，毫无疑问，值得我们用心去研读。作为一个英语语言文学和西方文化传统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仅仅阅读它、欣赏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以学者谨严的作风、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态度，认真地剖析它、研究它，以便更好地继承这份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但是，这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思想教育，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上帝存在的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也并非全是坏事，它促使我在作《圣经》文本分析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身上。我坚信高尔基的话：“文学即人学。”正是圣经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人性、人情、人心、人行及人道，即它的人学价

值，赋予了这本书永久的生命力。我把本书命名为《走出伊甸园》，就是希图通过我对《圣经》人学价值的分析和研究，让这本环绕着神学光环的书，走出“天堂”，重返人间，昂首以人的姿态，进入我们的文学殿堂。一切具有艺术感召力的文学作品，一定有其生活的源泉。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揭开圣经文学“神秘”的面纱，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和西方文化研究者能透过现象，看到它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一面，从而感悟灿烂的文化，领受文学的熏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本因为神学的迷雾而让人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目的巨著。

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宁波大学科技学院院长赵伐教授、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教授对我的鼓励和指导，感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学术专著资金的资助，感谢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给我的帮助。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同行和前辈——参考书的作者们，是他们的血汗浇开了这朵小花。

周 平

1999年7月于宁波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走出伊甸园 ——人类历史的必然·····	(25)
第三章	人间真情 ——《圣经·路得记》的人性美与文学魅力 ····	(41)
第四章	人生意义的痛苦求索 ——约伯叛逆性格探究·····	(52)
第五章	完美来自人性 ——大卫的善恶人生·····	(67)
第六章	人类爱情的千古绝唱 ——圣经诗歌及《雅歌》点评·····	(92)
第七章	人类智慧的结晶 ——《圣经·箴言》解析 ·····	(128)
第八章	千姿百态女人情 ——圣经文学妇女形象展析·····	(147)
第九章	人文主义的光辉 ——《圣经》民主思想分析·····	(165)

第十章 再出伊甸园

——是人创造了神·····	(178)
主要参考书目·····	(182)
附录：词汇与释义·····	(185)

第一章

概 述

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那样包罗万象，那样广为流传，那样经久不衰，那样深入人心。它对于人文世界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尽管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对《圣经》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基础；但这本经千年风霜雪雨，历数代风流人物，汇东西文化传统，集文、史、哲、法律、语言、伦理等等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却由于其有神论的宗教标签而被长时间列为禁书，长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不仅中国的读者对它敬而远之，中国的研究者更对它讳莫如深。

作者在长期的英美文学教学实践中感受到，在阅读或欣赏西方文学、艺术作品时，若不了解《圣经》人物、故事、典故、成语，就无法理解或深刻了解其内涵。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等直接反映宗教的美术作品自不必说；语言大师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必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平均每部戏达十四处之多；班扬、密尔顿等更是擅长以《圣经》内容为题材的巨匠，雪莱、哈代等也是深受其瑰丽文采熏陶的大诗人、大作家；一大批对现代英语影响巨大的现当代英语作家及其各种流派的力作，都深深打上了《圣经》思想或语言的烙印。下面仅仅是一些从英语课本中信手拈来

的例子：

I doubt whether Solomon ever had such a tree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temple at Jerusalem. (许国璋《英语》第三册, *Robinson Crusoe Makes Himself A Boat*)

这句话直译是：“我怀疑所罗门建造耶路撒冷圣殿时有过这么大的树。”《圣经》记载，以色列鼎盛时期，所罗门王为了完成先父大卫王的遗愿，征用了十几万能工巧匠，耗时七年，在耶路撒冷建成了第一座“长九十英尺、宽三十英尺、高四十五英尺”的圣殿。圣殿柱子、板墙用的都是香柏木，香柏木树高一般在二十米以上，采自黎巴嫩，采伐和搬运均十分艰苦。鲁宾逊将造舟之树与修建耶路撒冷圣殿的香柏木相提并论，意在强调树木过于巨大，突出了伐木、造舟、用舟之难；而这句话，则又在幽默中表现出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乐观精神。

I was there on a Sunday, and observed the rigour with which the young people were taught to observe the Sabbath. (余大綱《英语》第五册, *Severe Home Discipline*)

本文节选自英国现代作家塞缪尔·勃特勒的小说《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此话意为：“一个星期天，我在那儿观察人们如何严格地教导年青人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古老的旧约律法中的一条律例，是上帝授命摩西向以色列人晓谕的“十诫”之一：“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当守安息日，将它看作神圣的日子）（《出埃及记》20：8）。“安息日”原为每周最后一天，即星期六；后来基督教会将安息日改为每周第一天，即星期日。这天是犹太人休息、做礼拜的“圣日”。《旧

约》对这一天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做了严格的规定。如今的基督教家庭在礼拜日虽然仍要上教堂，但按老规矩“守安息日”的已经很少见，更不用说以此要求年青人了，由此可见小说中家规的严厉与保守。这与下文小主人公 Ernest 的父亲对他的苛刻要求和过分严厉的管教一样，反映出家庭空气的沉闷与压抑；恰好与孩子在这个年龄应有的天真活泼的天性形成极大的反差，使读者对小主人公的境遇产生极大的同情。

I used to joke that senior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would probably not be able to free so much time for the Second Coming. (徐燕谋《英语》第七册, *The China Connection*)

“the Second Coming”（基督复临）虽是耶稣死去一百二十年后才出现的宗教术语，但其概念在《新约·约翰福音》中已经出现。按基督教教义，“基督复临”是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其时，虔诚的信徒将通过基督与上帝欢聚一堂，而恶人将受到应有的处罚。所以，全体基督徒都要随时为那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基辛格博士说，“过去我常开玩笑说，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们也许连为‘基督复临’做准备的时间也腾不出来”，就是幽默地夸张他们为了出使中国成天忙碌，连为自己的最后归宿作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Let both sides unite to heed in all corners of the earth the command of Isaiah to “undo the heavy burdens… (and) let the oppressed go free”. (张汉熙《高级英语》, *Inaugural Address*)

“Isaiah”（以赛亚）是旧约四大先知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曾

预言过救主弥赛亚的降临，人们把他的话看作上帝的旨意，所以“以赛亚的命令”（the command of Isaiah）即上帝的命令。“undo the heavy burdens... (and) let the oppressed go free”（解除他们的重负，让受压迫者得以自由）出自《以赛亚书》（56：6）。肯尼迪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和作用在于：1）再次向听众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缩短与多数听众的心理距离，增强演讲的感染力；2）引用《圣经》原文做理论论据，增强演讲的说服力；3）与整个演讲所突出的简洁、雄辩而富于节奏感的圣经风格保持一致。

.....

据粗略统计，《高级英语》第一册共十六篇课文，其中有九篇共三十五处圣经典故，即整本教材平均每课超过二处。如果授课教师对课文中的这些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并给学生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那么对学生增加英语背景知识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研究西方文化而不研究《圣经》，就好像面对一棵没有根的树，不知其生命的来源一样。正如 T.S. 艾略特所说：“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的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你才能把毛弄来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得经过若干世纪的野蛮状态。”（《基督教与文化》）^①

但是，长时期的“极左”思潮使我们在《圣经》的神学意义面前望而却步，《圣经》的人学、文学意义始终不能露出庐山真面目。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界与文学界开始对这个研究领域伸出试探的触角。一些专家和学者相继写出或译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和著作：南开大学朱维之教授的《圣经文学十二讲》、南京大学

^① 转引自王以培：《基督与解脱》p. 123

郭秀梅教授的 *JOURNEY THROUGH THE BIBLE*、吕大吉先生的《西方宗教学说史》、张志刚先生的《走向神圣》和《东西方宗教伦理及其他》、陈村富先生主编的《宗教文化》、王志远先生主编的《宗教文化丛书》、梁工先生编译的《圣经诗歌》、江先春与沈弘合译的《宗教与文学》(海伦·加德纳著),等等。这些论译著从不同的角度对《圣经》、圣经文学和圣经文化作了研究和探讨,拓宽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给予了我们许多启示。即便如此,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也只是刚刚开始;要真正理解《圣经》强大的历史与社会感召力和非凡的文学感染力,必须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即它的“人”性。正是其人性赋予了它超凡脱俗的“神”性,使它成为西方人世世代代顶礼膜拜的圣书。研究《圣经》的人学价值,正是要让这本环绕着神学光环的书真正从神坛上走下来,昂首以人的姿态进入文学殿堂。本书题为《走出伊甸园》就是希图《圣经》能走出“天堂”,重返人间。

本书将借《圣经》中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通过对较为丰富的实例进行分析,充分展示其间的人性、人情、人心、人行及人道的魅力与力量;并结合中西方有关理论探讨《圣经》的人学价值,论述其人学价值对西方文学的历史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一、《圣经》其书

“圣经”一词源于希腊文 *biblia*,意为书卷,中文译文取其“神圣典范,天经地义”之意。从宗教意义上来说,《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是神学和基督教教义的根本依据。《圣经》成书历经一千多年,由各卷作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身份、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文体写成。信徒们相信这些作者所写的一切全是上天的启示,遂将它们汇编成册,称之

为“标准书”(canon)。基督教《圣经》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

“约”源于希腊文 *diatheke*, 拉丁文译作 *Testamentum*, 英文译为 *Testament*, 是“盟约”之意。基督教认为, 上帝通过摩西, 传律法于“选民”(上帝选中之民)以色列人, 此为第一约。后以色列人背约犯罪, 上帝乃终止“旧约”, 差圣子耶稣以肉身降世, 施行救赎, 与人类重订“新约”。对于基督教徒来说, 《圣经》即上帝的语录, 表明了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人类及万物的起源、人类与上帝的关系、符合上帝意志的伦理道德准则、生与死及现实与未来的联系等。

《旧约全书》即犹太教经典, 由基督教继承而得。《旧约全书》分为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和后典。基督教《旧约全书》共收三十九卷, 大约完成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由于筛选文章的标准难于统一, 天主教使用的《旧约全书》直到 1564 年才最后确定为四十六卷。《新约全书》共二十七卷, 《新约》的汇编始于公元 1 世纪中叶, 到 4 世纪才最后定型。

《圣经》中所收书目的卷数和次序, 各教派略有不同。历来没有争议的各卷被称为“正典”(Canonized Scriptures), 有过争论的各卷被称为“次经”(Apocrypha)。“次经”问题构成了基督教三大教派使用的《旧约》在书目和内容上的差别。对于普通读者来说, 圣经著作还包括一些东方教会(如叙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在较晚的时期所编的一些书籍。就文、史、哲诸方面的意义来说, 这些书籍的价值并不亚于正经和次经; 但是受当时的神学思想的严格控制和影响, 多数人认为这都是些不足为训的东西, 所以被斥为“伪经”(Pseudepigrapha)。《圣经》、《次经》、《伪经》, 加上本世纪中叶发现的《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合称为圣经“四大文库”。

《旧约全书》原本用希伯来文写成, 最早的希腊文译本为七

十子希腊译本,《新约全书》原文为希腊文。以后的主要《圣经》译本有叙利亚文译本、拉丁文译本、英文译本和中文译本。其中以英文译本“钦定圣经”(The Authorized Version)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

希腊文七十贤士译本(Septuagint)是《旧约》最早的译本,大约译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收入的五十卷经书中,除现有的三十九卷“首正经”外,还有“次经”七卷和“伪经”四卷。

叙利亚文的《旧约》翻译时间仅次于七十贤士译本。叙利亚文的《新约》则是最古老的译本,因为该译本所使用的语言与耶稣当时所使用的语言最为接近,所以极具研究价值。

拉丁文译本也在《圣经》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564年在特兰托公会会议上,天主教当局正式宣布的哲罗姆(St. Jerome)的通俗拉丁文译本(Vulgate)。

天主教使用的《圣经》英文译本是1609年核定的“多阿伊本”(The Douai-Rheims)。基督教新教使用的《圣经》译本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钦定译本”、“标准本”(The Standard Version)和《新英语圣经》(The New English Bible)。

中文《圣经》译本有景教的译本,已失传。天主教的中文译本,是在北京“思高圣经学会”组织的十几位方济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圣经》原文翻译的《圣经》合订本,1968年出版,共耗时十六年。基督教新教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圣经全书》的中文译本,是1822年由马士曼(John Marshma)和拉沙(Joannes Lassar)根据拉丁文本在印度译成的。第一部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中文《圣经》是1813年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译的《新约全书》。之后,又有包括马礼逊先生的儿子在内的几位学者,于1837年到1840年陆续出版的《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中文版;还有1853年香港会议的产物——《新约圣经》

中文版。1890年基督教会在上海举行传教大会，决定出版《和合译本》(Union Version)，并分别于1906年、1919年先后出版了《新旧约圣经》。第一本由中国人翻译的《圣经》，是1929年出版的朱宝惠、赛兆项(Sydenstriker)合译的《新约圣经》。后来又有1933年王宣忱译的《新约全书》、1946年吕振中译的《新约全书》、1970年出版的全部《圣经》等。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圣经》远远不只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更应该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它对西方世俗文化的影响之深远，无论怎么说也不过分。目前，《圣经》已有三百零一种文字的版本，其中《新约》被译成了一千八百四十八种文字和方言。《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书。

二、《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希伯来文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文化之一，它与古希腊文化一起，同为欧洲文化的源泉。来自东方的希伯来文化和来自西方的希腊文化，沿着各自的道路发生、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又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互相碰撞、斗争、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文化体系——基督教文化。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它们“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①。

古希腊文化对西方的文艺复兴的影响早已众所周知，而希伯来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许多人却知之甚少。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5年)以后的三百年，是欧亚地区的“希腊化”时期。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希腊语成了中东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国际流通语。在本土已然衰竭的希腊文化，在它所侵入的移

^①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